

守主体之本，行文明之路

■郑崇选

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入全面发力、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如何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将文化主体性的研究阐释纳入“三大体系”的框架当中，推动这一原创性概念的学术传播与文化认同，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担负的理论使命。复旦大学教授朱鸿召的新著《文化主体观》聚焦文化价值层面主体研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情感逻辑等四个维度，对文化主体与文化主体性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史论结合的学理研究。

该书作者曾多年在文化智库任职，参与和主持多项重要的文化决策咨询项目，一直扎根于火热的文化生活。他对文化的理解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进行理论演绎，而是从具体文化实践出发，见事见人见情，将逻辑起点建立在充分的文化实践基础上。“人以文化，文以化人”，是中文语境下文化的根本之所在。大而言之，文化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其中的精神文化，包括思想理论、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观念形态。文化的核心要义是价值观念，它决定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提供根本目标和方向意义，“让求救不必羞愧，让脆弱不必躲藏”。

这一切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时间，也需要无数光亮支撑。姜涛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充满光的细节——某天晚上查房，一位患抑郁症的老先生打着手电筒给病友念诗：“我是一座孤岛，但在深海里，我们紧紧相连。”人们本就应该如此相连。

人是生命的主体，具有意识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具有对客体的主动性和支配性。主体对身份的自觉、对创造的自主、对历史的主动，即为主体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很多场合，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丧失其主体性，表现为奴性、自我殖民性、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异化、物化、饭圈化等不良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和新时代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质，破除历史虚无主义迷魂阵，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昂首阔步、勇往直前。本书鲜明提出，中国人民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中国人民的高度文化自信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道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口中有所疑惑的真知灼见。

由于曾经蒙辱、蒙难、蒙尘的惨痛经历，重建文化主体性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书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建构及其特征，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文化建设的上海实践，紧密结合上海人民城市建设中的文化命题，既有历史纵深，又有具体案例，概括出文化是一种有高度的思想方式、有温度的服务方式、有深度的工作方式、有亮度的治理方式、有厚度的生活方式，生动鲜活，可圈可点。与此相关，该书对宋庆龄、黄炎培、张思德、赵树理、陈望道等近现代历史人物进行文化分析，知人论世，入情入理，既是抵达文化主体性的深厚情感体验和深层精神心理分析，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人格背书，字里行间情深意浓、新意迭出。（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化主体观》朱鸿召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真正能够支撑患者的，是“那些被理解、被接纳的瞬间”。 视觉中国供图

心有归处，方得安定

■叶克飞

一个窥见社会的窗口

1993年就进入安定医院的姜涛，亲历了中国精神医学从封闭、匮乏到逐渐开放、走向科学的转变，也陪伴无数人走过精神困境的幽暗角落。精神病院不仅是治疗之地，也是一个窥见社会的窗口，透过它能看到不同人生。他在《安定此心》中的记录，也让人们得以了解精神医学。正如书名所表达的那样，精神疾病并不可怕，理解、包容与接纳，是治愈的最好手段，人只要找到与自己和解的力量，心便安定。

姜涛作为从事精神科临床三十多年的医生，对于“和解”与“安定”的诠释，绝非廉价套话式的心灵鸡汤，而是扎根于大量临床诊疗案例——涵盖双相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以及药物成瘾等多个精神科常见疾病，更源于他对患者的长期观察。

这些观察和思考，原本只是散落于姜涛经手的一个个病例中。在《安定此心》里，姜涛提到让他决定记录这一切的瞬间：“一天凌晨4点，我站在住院部走廊，看见窗外清洁工开始清扫街道。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每天都在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精神疾病从来不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它藏在那些说不出口的日常生活细节里。”

书中写到，上世纪90年代初，姜涛刚刚开始工作时，中国对精神疾病的分类体系尚不完善，分类标准也未与国际接轨，整体诊疗水平相对有

限。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内对精神类疾病的认知、诊断和分类能力大幅进步，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疾病的诊疗已完全与国际同步对接。

诊疗标准与国际接轨后，精神疾病诊断率显著提升，患者基数更清晰。据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达16.57%。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册精神科医生约6.4万人，医患配比远未达1:200的国际标准，而且地域差距明显，许多地区缺乏专科诊疗渠道。

呼唤理解和包容

姜涛的从业经历也是社会观念的改变历程。他回忆，工作之初跟随上级医生开药时，总是几种传统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极其明显。渐渐地，他认识到药物和住院并非万能，真正

能够支撑患者的，是“那些被理解、被接纳的瞬间”。

书中提到，近年来精神疾病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2016年后，姜涛门诊中18岁以下患者占比超30%，发病年龄降至12岁左右。据《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患病率达15%—20%。学业压力、过度内卷、人际交往等问题导致学生抑郁高发，不少孩子厌学甚至弃学。而许多家长仍停留在“现在的孩子吃不了苦”“别人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的认知层面。

姜涛见过太多这样的误解，但实际上，孩子从不是“突然坏掉”的，精神疾病肯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绝不是一个人的困境，而深植于氛围和观念中。许多孩子的心理危机，根源都在家庭，父母眼中那些不可理喻的“叛逆”和“矫情”，实际上是孩子的求救信号。心理疾病是神经系统的问题，无关坚强与否。

很多时候，姜涛要治疗的其实不仅仅是患者本人，还有患者的父母。书中提到一个名叫唐嘉的病例。姜涛认为她是一个被家庭、学校、医疗系统共同“制造”出的病人，其幻觉与妄想完全是强烈刺激引发的解离状态。

唐嘉17岁时，病历上已经写满全国各地知名精神专科医院的诊断记录，结论均为精神分裂症，她服用了大量抗精神病药物，但收效甚微。姜涛认为唐嘉更像是解离症状，因此坚持按照治疗解离的思路调整用药，病情一度出现好转。他还发现，唐嘉遭遇过严重的校园霸凌，但向家人诉说时，父亲只会说“忍忍就过去了”，母亲是生物科技专家，常年在国外，但强势地掌握着家庭话语权。

姜涛仅给唐嘉治疗了三个星期，唐嘉的母亲便强行办理出院手续，去找“更有经验的国际权威”。姜涛当面表示，唐嘉并非精神分裂症，“只是用解离的方式承受一个孩子不该承受的孤独”。结果唐嘉的母亲打断他的话，以一句冷冰冰的“我是来治病的，不是来听心理分析的”回应。结果唐嘉重新吃回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一个月后再度变得呆滞迟钝。

面对这种“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挫败感，姜涛依然选择记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精神疾病的实质，呼唤理解和包容。

父母需要理解和包容孩子，学校和社区也要提供缓冲空间，这是姜涛的建议。在他看来，药物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但目前很少有学校能够提供足够的缓冲，一旦孩子回到原先的高压状态，就很容易再次陷入困境。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来说，经济和情绪的压力都非常之大。孩子无法上学、频繁治疗，意味着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这就需要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正如姜涛所言，一个生病的孩子背后，是一个承受巨大压力的失序家庭，更映照一个包容性似乎不够的社会。

人们本就应该如此相连

在精神疾病领域，观念差异仍然非常明显。在乡村社会，许多人仍然将精神疾病视为“鬼神作祟”“心思太重”，导致无数患者的病情延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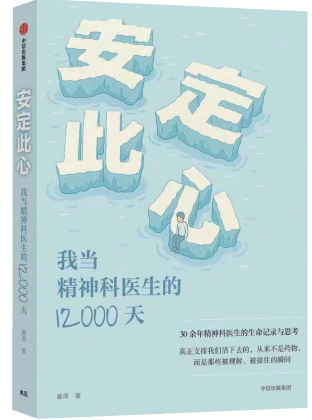
因为心理健康意识相对落后，农村抑郁患者确诊率很低，自杀率反而比城市更高。可以说，那些被落后意识困住的农村患者，也是被自己生活的社会

所困住。姜涛在访谈中提到，城市的情况虽然好得多，但患者同样受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精神疾病会有相应的社区服务，由社工、康复师和有资质的志愿者来帮助患者。但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就是医院与家庭直接相连，家庭负担很重。

精神疾病从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它始终与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相关联，它的治疗也离不开社会的关注与观念的改变。《安定此心》中没有完美病人，也没有全能拯救者，充斥着医生的误判、家属的矛盾和患者的自毁，呈现出复杂的人性。姜涛所呼唤的是科学诊疗，也期待社会能够提供让痛苦被安放的空间，“让求救不必羞愧，让脆弱不必躲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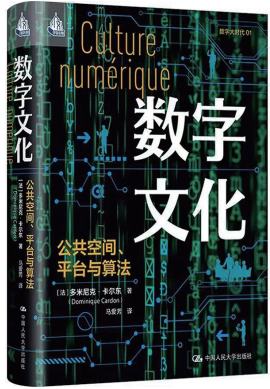
这一切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时间，也需要无数光亮支撑。姜涛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充满光的细节——某天晚上查房，一位患抑郁症的老先生打着手电筒给病友念诗：“我是一座孤岛，但在深海里，我们紧紧相连。”

人们本就应该如此相连。



《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姜涛著 中信出版集团

数字时代的清醒剂



《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马爱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事起源写起，指出自由和管控从一开始就同时内嵌于互联网的文化基因之中。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明，与美国军队的战略密不可分（其最初目的是美苏冷战时期计算炸弹弹道），但互联网设计者们的精神指导，却是20世纪70年代的自由和合合作精神。

经过长期研究，卡尔东得出如下结论：网络继承了互联网的自由主义精神。每一个创建网站的网民都获得了一项权力——可按照自身意愿，把自己的网站与其他网站链接起来。这种权力是网络群体自治的源泉，是自下而上创新驱动力的源泉，是那些生产共同物品的网民社群团结互助的源泉，是集体的智慧源泉——简而言之，是网络根本价值的源泉。

卡尔东认为，互联网极大扩充了公共表达空间，公民的表达突破了物理限制，催生了“参与式文化”。在传统的公共空间中，只有一小部分发言人可以表达观点，而观众则始终处于沉默状态。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言论，无疑是社会学上的一项重大创新。数字社交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我们的谈话、社交、兴趣爱好和选择，能够在公共场所被公开展示和分享。

《数字文化》对平台经济的洞察也十分深刻。卡尔东认为，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工作组织方式、市场形式、做生意的方式、提供服务的方式、广告模式等。通过协作，通过把个人智慧汇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产生集体智慧，其价值远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经济变革源自数字技术，而经济变革带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新分配网络化所创造的价值。

“平台服务之所以是免费的，是因为你是产品。”这句话的背后，蕴

含着对平台经济的深刻批判——平台经济以剥削网民的数字劳动（即让网民“免费工作”）为基础：所有免费使用平台服务的人，实际上都在为平台“打工”，因为平台会从用户的每一项活动中提取价值。当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产生的正面外部性，不是被用来创造更多公共价值，而是被平台单向提取时，它们就会成为数字经济下企业谋利和谋求市场优势地位根源。这正是“监控资本主义”的核心观点：在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致富之后，资本主义正在对公民进行商品化，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数据流，以此增加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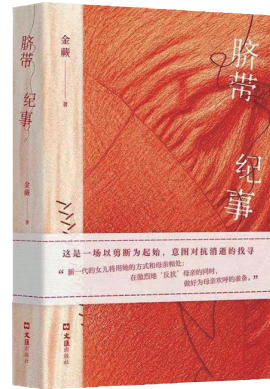
互联网先驱们倡导的自由、分享、协作、去中心化的主张，深刻镌刻在互联网文化之中，成为全球互联网文化的底色。但这种底色，在平台经济的扩张中逐渐被遮蔽。根据《数字文化》的观点，2003年第一批数字社交网络的出现，是网络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卡尔东在书中强调：人在数字时代的自由，建立在对技术正反应的清醒认知之上——没有清醒的认识，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数字技术的发展进入反乌托邦时代，标志着数字技术和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人不再盲目相信数字技术会自发地改善人和人，也不再认为数字技术天然是一股“善”的力量；相反，人们开始主动发挥个体能动性，一方面努力建立起对数字技术影响的全面认知，坦然接受数字技术“恶”的一面，另一方面积极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遏制数字技术激发的、一味追求新事物的文化冲昏头脑。

“我们要有必要与‘时髦’保持距离，避免被数字经济激发的、一味追求新事物的文化冲昏头脑。”

重新触摸那条纽带



《脐带纪事》金燕著 文汇出版社

■郭梅

“脐带纪事”，是一场以剪断为起始，意图对抗消逝的找寻。”正如金燕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脐带作为生命诞生的第一个连接，天然承载着关于血缘、断裂与重塑的叙事张力。脐带在胎儿离开母体时被剪断，曾经存在过，后来却消失了。而《脐带纪事》告诉我们，那条从出生时就被剪断的脐带并未真正消失，它化作隐秘的印迹。金燕通过她的文字带着我们在断裂处重新触摸那条脐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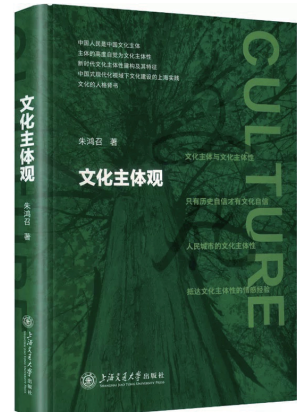
《脐带纪事》的创作契机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在金燕闽南老家的宗族文化中，族谱上写满了男性的名字，而真正承担生养责任的女性，却始终被排除在这一秩序之外。金燕这才惊觉，其实她对家里的女性长辈一无所知，她们就像那根被剪去的脐带。于是，在2023年7月，为追溯女性祖辈的生命史，金燕辗转中国多座城市，寻访数位素未谋面的老人，与她们展开对话，追寻那些她们认为不值一提的过往。这场长达一年半的“脐带”系列

访谈就此开始。金燕曾说，这个以女性性祖辈为圆心、不断生出涟漪的访谈，于她几乎是一种“撬开蚌壳般”的证明，被撬开的时间内部，是女性未曾被讲述的珍珠。

《脐带纪事》共分十章，每章围绕一个家庭的女性长辈展开，她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代之间，有当金燕说完“我想听听你讲自己的故事”的瞬间就掉下眼泪的志志美，有频繁出入电影院银幕上的替哭冲淡异乡落寞的苗桂芬，有幼年替母亲到芦席厂上工而永远伤到右眼的徐乐琳，有刚回国受到当地人嫉妒与排外的印尼华侨屈美月……每位女性都堪称一部家族史诗。

但这种“投向”并非自上而下的凝视，金燕在《脐带纪事》中采用的是参与式写作，她放弃传统田野调查的模式，通过同龄朋友引介进入家庭，受访者不再是等待被书写的沉默客体，而成为拥有选择权的叙事主体。这种倾听方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将他人的苦难转化为自己的文学资本。在作品完稿之后，金燕将叙述的最终确认权交还给讲述者本人，书中每一位女性长辈（或其家属），都审读了与自身相关的章节，所有呈现均获得当事人的确认。在结尾的致谢中，金燕认真地说“向所有受访者致以最深切的谢意”，这种真诚无疑打动

着每一位读者。“我听我奶奶讲古（闽南语，指讲述过去的事情），并不是为了搞清楚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而是为了理解她当时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处境、是什么感受。”女性如何回忆自己的一生，就会形成一种相应的叙事基调。作为非虚构文学，“如何讲述”远比“讲述什么”更具价值。金燕的工作，是让我们重新看见这条隐形的纽带，并在看见的瞬间，理解自己从何处断裂，又将向何处连接。



《文化主体观》朱鸿召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